

国民音乐教育论

Guomin Yinyue
Jiaoyulun

熊岸枫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国民音乐教育论

熊岸枫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音乐教育论 / 熊岸枫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068-3525-1

I. ①国… II. ①熊… III. ①音乐教育-教育理论 IV. ①J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4135号

国民音乐教育论

熊岸枫 著

责任编辑 邹攀峰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京华诚信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99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525-1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简 介

《国民音乐教育论》分为两大板块,即基础篇和关联篇,其围绕国民音乐教育“宽口径”这一目标,从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阐述了国民音乐教育客观存在的目标、使命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各单元拓展。“基础篇”力求解决理论方面的某些关键层面的问题,主要是从基础定位和单元构建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创造性地回答了“何为‘国民音乐教育’”和“实施国民音乐教育的关键性环节与重要步骤”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关联篇”主要是作者在多年的国民音乐教育教学实践中所积累的一些经验总结及相关成果,侧重于实践层面的建设,并力求向更为宽泛的领域寻找突破点,对“基础篇”形成支撑。

本书立足于大国民音乐文化与大国民音乐教育普及和发展的总体目标,倡导让音乐艺术以科学人文的理念、全新的方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活生生的现实,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其所定位的国民音乐教育新平台建设的构想,将为国家整体的国民文化建设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前 言

本书2005年开始构思,2005~2007两年多时间完成草稿,其后一直到2012年,断断续续地进行修改,主体部分才得以初步确定。另外,还收录了笔者1997年和2002~2005年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所写的一些文章,因考虑到与主题的衔接,对其中的某些篇章或多或少地作了一些改动。可以肯定地说,它还很不成熟。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观念上,它肯定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今后的完善与发展,道路还十分漫长。

这也就是说,在此表达是否有信心没有太多的意义,科学研究是一场探险,它完全有可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要做好恪守孤独和承受风险的一切准备。“国民音乐教育”这个名字虽然不新,但本书给它的定位以及由此展开的讨论,却具有某种程度的探索性和创新性。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前人曾经有过一些成果,但至今为止,系统而又多元的架构性成果,却都还未曾有过。笔者学识浅陋,却要以身犯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从决计要创作此书的那一刻起,笔者就抱定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念头。尽管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展开,各种困难和阻力也不期而至,我从未产生过一丝半点动摇的思想。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什么专家学者,我只是广大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怀着善良美好的愿望,想用音乐来为社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希望人们提高音乐素质,改良日常的精神文化生活,进而对提升整体的国民文化品格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于国民音乐教育的历史轨迹,从“有教无类”的孔子“乐教”思想到近现代历史上出现的“教育救国”思潮,都能够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和依据。而在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受益,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代的信息化条件下,国民音乐教育拥有了更多的渠道,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出应有的力量。当然,现代高速发展的科技水平及条件的诸多助益,还是代替不了由人亲历亲为的面对面的扎实工作。因此,本书所定位的国民音乐教育,强调通过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与传递的方式来完成教育教学过程,把人类的优秀音乐文化成果不折不扣地送

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街头巷尾,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新的音乐艺术形式。笔者始终认为,传统教育手段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心手相连、情感交融的优越性,能够实现教育教学效率的最大化。

笔者2002~2005年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所写的两篇文章,是在导师和课程教师指导之下完成的。时过境迁,有些观念和提法,包括笔者的想法,都已经发生了改变,进行修改,实属事物发展之必然,相信我的老师们都能理解。老师们曾经给予的谆谆教诲之情,在此再一次叩谢。特别不能忘怀的是,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冯光钰先生在生前曾多次表达关切。笔者最后一次与冯先生通电话是在2010年年底,在这一次通话中,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共同完成“国民音乐教育”专题研究并为《国民音乐教育论》作序的全部请求。未曾想,2011年年初,先生却因病逝世,诸事顿成笔者平生之最大遗憾。屡屡回首先生音容笑貌,舐犊之情,溢于言表。笔者唯有潜心苦旅,攻坚克难,才能对得起先生的在天之灵。

最后,仍需要再次强调的一点是,在社会文化建设的大业中,国民音乐教育的工作只能充当其间的一份子。本书对其给予的定位是根基于前人成果而力求创新,要恰如其分地解决好“为什么做”和“怎么做”的问题,无疑是一项慎之又慎、复杂而又辛苦的任务。笔者虽有信心,但苦于才疏学浅,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献此鄙陋之作,惟愿能抛砖引玉,并可以吸引一批又一批有志者来积极奉献和勇敢开拓,当属荣幸之至——基于此,本书的冒昧唐突甚至缺点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各位专家学者、仁人志士以不吝赐教批评指正,笔者在此深致叩谢。

熊岸枫

2013年3月22日于湖南怀化学院

目 录

基础篇

一、导论	1
二、国民音乐教育:厘定“来路”与“归途”的重新出发	5
三、国民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	21
四、国民音乐教育的具体实施途径	26
五、国民音乐教育实施工程体系中理论上与技术上的“农民问题”	34
六、城镇社会发展的多元格局与国民音乐教育的有效开展	46
七、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民音乐教育及其他	57
八、国民音乐教育的“政治”:服务型政府的“四两”“千斤”	71
九、民族民间音乐的“原生态”和“发展态”与国民音乐教育	79
十、在国民音乐教育与音乐产业化之间	87
十一、国民音乐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及其与专业学科建设关系构想	96
十二、国民音乐教育与非物质文化发展	112
十三、分类实践:教案与活动创意设计	114

关联篇

十四、口语戏曲音乐曲体结构分析的否定之否定	135
十五、论国民音乐教育师资力量培养主渠道的人才质量保障	215
十六、关于格里格 e 小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几点思考	238
十七、生存困惑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途:路遥的启示	249
十八、国民音乐教育中的音乐作品分析实例	256
附录 A 实施国民音乐教育的图书推介	272
附录 B 谱例	273
后记	291
参考文献	292

基 础 篇

一、导论

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从共时性来考察,普及型、公益性、宽口径的“国民音乐教育研究”课题都是基于国内外在该领域已经取得的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此作为基点,进一步延展到非物质文化发展的前景和规律性这样的广度与深度上,使得研究本身增添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作说明:

第一,从宏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发展的研究情况来看,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十年中,国内的成果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有了较为扎实的增长。在所有这些成果中,以艺术特别是音乐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项目,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已经搭建起一个体系性的广阔平台。第二,从国民音乐教育的研究情况来看,视野则可以涵盖古今中外,有关“乐教”和美育的理论成果十分丰富,业已形成一個立体多元而又十分严整的体系链。此外,本研究得以充分衍展的核心基础,是纯形态意义上的广义音乐学,其各个专属领域(含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丰富的。相对于本研究来说,所有这些方面具备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条块清晰,互为关联,为一些专属方向性应用与综合应用的研究工作和事项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性的铺垫。第三,面向全体国民的“国民音乐教育研究”离不开广义的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支撑,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根基深厚,在量与质两方面都完全可用“汗牛充栋”来描述。相对于本研究,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切入:(1)传统的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产生的效应,在整合或者综合的维度上已对社会形成重大影响,重点体现在实际的研究应用上主客体之间稳定的立体主从关系的自觉配置与科学实践。从其社会反响来看,传统的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2)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从中、外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它们大体上比较好地顺应了信息化时代社会的变化发展规律,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突破。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间也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瑕疵,比如说众所周知的浮躁、“伪学术”等因素。除此之外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折中和犬儒,特别是在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四平八稳,左右逢源,最终失去了立场,模糊了标准。这些,在用作佐证甚至是基础的理论支撑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慎重。以上三个方面,所考量的只是与本研究直接发生作用的一些领域,在研究过程中,它必然还要涉及哲学、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问题,甚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某些成果,在某种情形之下,也应适时适当

地大胆借鉴和运用。这些间接层面的研究成果,一是因其庞杂,二是因其将在本研究的实施过程中融会贯通,故不在此作专门的研究现状述评。

在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无论直接方面还是间接方面的关联,上述研究成果都只是停留在与本研究“相关”的层次或者领域。到目前为止,纯粹意义上如本书所定位的普及型、公益性、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研究”系统性成果,可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在历经整整八年的坚守过程中,虽然一直在积极寻求某种实质性的理解,但最终还是未能偿愿——真正意义上的课题建设是严谨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如果无视前人在国民音乐教育方面丰富的感性实践成果和有待完善的地方,这对于国民文化的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发展,特别是对于音乐艺术与国民音乐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遗憾。当然,笔者有信心朝着既定目标一直努力下去,同时又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有识之士的理解、宽容、帮助和支持。

普及型、公益性、宽口径的“国民音乐教育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国民音乐教育研究的瓶颈,使“国民音乐教育”的称谓与“国民”这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名实相符。它所执着的方向是一种积极的现实主义,专注于其本身的一系列专业技术问题,同时也积极寻求一些合乎社科研究规范的材料来支撑。

那么,为什么要将国民音乐教育研究放置于“非物质文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是因为,教育也是一种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文化,在国家不断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发展的宏观战略背景下,作为关乎全体国民的音乐教育工作,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在国民文化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国民音乐教育研究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一份责任,作出应有的贡献。

“始于乐,兴于艺,达于文,成于气”,是之所以开展本研究的根本意义之所在。音乐艺术在教化人伦、强健品格、养成文化等智性启迪功能方面,具有一般教育手段所达不到的一种特殊力量。同时,在传播途径、手段和具体工作的各类基础操作方面,它还具有其他艺术门类所难以比拟的可塑性和便捷性。对于国民文化的复兴,选择音乐教育作为起点,最起码也是具备可行性、值得尝试的。但是,由于多年来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民”层次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而且在这些并不丰厚的东西中,真正称得上学术研究成果的,也是比较少的。这种情况,与真正意义的国民音乐教育所能做和能够完成的、或许也是必须要做和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与目标,差距较大。到了实际操作环节,因为缺少科学依据,常常陷入一筹莫展的尴尬境地。所以,基于国家国民文化复兴宏伟目标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发展宏观战略要求的,以科学性、体系性为标准的国民音乐教育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基于上述可知,本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在前人已经做过但还做得不是很充分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它有着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国民音乐教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中的绝大部分,将重

心基本上落在了学校音乐教育这一个点上,余下的那些与本研究在方向和目标上相近的部分,数量上并不十分可观,主要是体系性的东西还比较欠缺,与真正意义的国民音乐教育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难以满足国民音乐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本课题针对这些情况,将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探寻实施国民音乐教育计划与目标的有效途径,积极发挥国民音乐教育研究在国家宏观的国民文化创建、非物质文化发展整体战略中的基础攻坚功能,为国民音乐教育工作的展开提供标本,最终形成体系性的文本。

本书将围绕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重点研究:

- (1)新形势下国民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 (2)新型国民音乐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3)国民音乐教育建设的具体实施途径;
- (4)国民音乐教育体系中理论上与技术上的“农民问题”;
- (5)城镇社会发展的多元格局与国民音乐教育工作有效开展的几个关系;
- (6)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民音乐教育;
- (7)政府行政的良性渗透对国民音乐教育建设的重要助益及反作用力;
- (8)民族民间音乐的“原生态”、“发展态”对国民音乐教育区域性攻关的积极意义;
- (9)国民音乐教育与音乐产业化的关系;
- (10)国民音乐教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关系;
- (11)国民音乐教育文化与音乐非物质文化的“立体主从”架构关系;
- (12)国民音乐教育的一些具体的环节性工作。

本项目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有如下三点:

(1)国民音乐教育应针对全体国民来展开,这种真正意义的国民音乐教育及国民音乐教育研究不是学校音乐教育与社会音乐教育及其研究的简单相加,它首先需要破解传统的瓶颈,使其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宏观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使国民音乐教育在国家整体的文化创新机制中充分发挥排头兵、生力军的作用。同时,这无疑也是实现国民音乐教育实至名归的最佳途径。

(2)落实到专属领域的实施环节,国民音乐教育应与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紧密的关系,稳固自身发展的依托,增强生命力与影响力,同时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发展贡献一份力。

(3)无论是国民音乐教育实践成果还是国民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都应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活生生的现实。为此,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个人,都应该作出积极的努力。特别是从事国民音乐教育实践和国民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相关部门和个人,更应该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在此务必要说明的一点是,本研究不可能解决有关国民音乐教育实践及其理论研

究的所有问题,它只可能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片段,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课题将主要采取社会调查法、会议法、文献法来进行研究。

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在前人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提出“国民音乐教育应针对全体国民而展开”的观念,对于破解传统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理论架构和基本思路。

(2)将国民音乐教育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发展从概念意义的高度有机结合起来,对国民音乐教育实践及其理论研究的工作而言,前景十分广阔。

(3)专门针对国民音乐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进行系统性研究。

(4)专门针对国民音乐文化建设与国民文化生态建设中全民性音乐教育的特殊价值及其当下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进行系统性研究。

本研究的理论渊源没有局限于历史上某个特定的点,国民音乐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支系,“古今中外”的浩瀚时空里存在着难以计数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与本研究的关系最为直接的,还是自“乐教”兴起以来的三千年中国文化史——作这一点说明,也可以说是在预先答问——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改良主义思潮,与我们今天实行的“科教兴国”战略之间,是能够建立某种程度的关联的,国民音乐教育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与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此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在对前人的成果与贡献(改良主义思潮的建设性影响)建立在应有的尊重的基础上,如果一味地拘泥于这种联系,就必然局限创造的视野,但如果步子迈得过大,又会造成理解和接受的困难,并最终失去研究的意义。所以,本研究所采取的立点,援引了“当代性”这一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回避但也不积极主动地去靠拢“近代性”的某些事项,以此而期待本研究的顺利开展。音乐教育在美育中的特殊属性、地位与功能,使其与有着强大“西学东渐”背景的改良主义事项不能同日而语——尽管其过程也存在着鲜明的乐教西化的纹路,至今仍然没有改变,但也正是这一情状的突出存在而彰显了本研究的特殊意义。一个国家的乐教,应在主体文化的框架结构内实现独立自主的建设,同时,它的开放性也理应是在完全处于文化觉悟的大前提下自主来选择的。而事实上,我们从来就不缺乏自主性,我们需要共同来面对一些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恰如其分地选择。

二、国民音乐教育：厘定“来路”与“归途”的重新出发

从根本上来说,国民音乐教育不应是一个侧重于国民阶段性年龄的教育工作,它应该涵盖国民整个人生。但时至今日,一般论及于此,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于以国民阶段性年龄的音乐教育这个“偏”来概全呢?追根溯源,国民音乐教育有一个总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大本营,即:国民教育。在很多版本的阐释中,“国民教育”都无一例外地沿用了几乎同一口径,其重心均把对于国民的阶段性教育作为基础的归依,而这,又与人类社会漫长发展进程中对于生产力的要求有着紧密的联系。既然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条件,笔者却要尝试运用另一种阐释并以此付诸行动,是否在于一件违背规律的事情呢?在当代化的背景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是否已为国民终其一生的全面发展具备了充足的资源?国民音乐教育要“即时性”地面向全体国民展开,配套的软、硬件环境准备好了吗?等等。面对着这些目前基本上还“无解”或者说还存在大量实际困难的问题,要想从科学的高度给出国民音乐教育的基本定义,直接的感性实践资源仍需要梳理,而专门的理论成果因比较分散也亟待整理和充实。

关于什么是国民教育,下面有几段阐释,首先是顾明远先生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简编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给出了下面的定义:

国民教育亦称“公共教育”。国家为本国国民(或公民)实施的学校教育。一般为国家规定的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即小学和初中教育,有的国家还包括幼儿教育 and 高等教育。……

在此基础上,再来看看由雷沛鸿等著、韦善美主编的《雷沛鸿文集 续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基本问题》(原载《广西教育通讯》第2卷1、2期合刊,1940年出版)一文中,有如此表述:

……在学术的昌明方面,我们中国人固应与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共同负责,而在教育的普及方面,更应做到“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方能达到民主的途径,亦足以达到民族解决之境地……

……

现在归纳起来,我对于教育的观点(point of view)是这样:

1. 教育范围(Educational scope),要求普遍的大众教育(A larger education);
2. 教育功能(Educational functions):要求动的活的教育(A more active and dynamic education);
3. 教育理想及目标(Educational ideals and aims):要求专精而现实的教育(A more specific and realistic education);
4. 教育制度(Educational agencies or institutions):要求种类各别内容复杂

的制度(A more varied and more complex education)。

.....

另外,笔者于2011年8月3日查阅“百度百科”,关于“国民教育”,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国民教育,即义务教育,指政府有义务运用公共资源保障所有适龄儿童接受的教育。义务教育的三个基本原则是强制、普遍与免费。凡是适龄儿童都应强制接受教育的义务,并且教育对象没有阶级或是出身的限制,此外还必须是免纳学费的。1717年,普鲁士王国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一款指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现代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实施义务教育,但年数和成效不一。

根据上述这些解释可知,国民教育属义务教育,从它开始到今天,其时间段一般都局限于小学和初中阶段。由此类推,贯穿于其间的音乐教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国民音乐教育。对此,笔者必须首先旗帜鲜明地表达一个立场:如果本书的中心议题自始至终就局限于这一狭窄的范围的话,则写作没有任何的意义。笔者从产生写作冲动的那一刻起,所瞄准的就是一个让国民音乐教育的“名”与“实”相符的目标,即上述第二段资料中所提到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一款的前半句,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真正的国民音乐教育,首先必须是面向全体国民的,然后它必须是纯公益的。基于这样一个大的前提,国民音乐教育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在这本书中,广义的国民音乐教育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所采取的对于全部公共音乐资源的选择性学习与教育行为,它的总体特征是宽泛自由,没有明确的阶段之分,不带任何强制性,实施对于全部公共音乐资源的选择性学习与教育行为的地点是学校、社会、家庭,内容与某些特定规格与编制内的层级式音乐资源存在交叉但也有着较大的区别,获取教育的途径是免费、付费、自主行为(包含获得自由的义务教育服务等成分)、非义务等多种方式并存。狭义的国民音乐教育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称为基础层次,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由政府主导,通过正式的教育机构,运用某些特定规格与编制内的层级式音乐资源,所采取的选择性学习与教育行为,它的总体特征是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与目的性,有着明确的阶段之分,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具有明显优于一般的大教育的灵活性,实施对于层级式音乐资源的攻关性学习与教育行为的地点主要是全日制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获取教育的途径一般为全免费的义务性或者公益性的形式;第二个层次称为高级层次,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参与和接受的音乐教育,它是由国家根据基本国情与战略需要来统一组织实施的,一般经由政府专门机构制定面向全体国民的音乐教育标准(即

国民音乐教育“国家标准”),并组建起专门的工作队伍,它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对全体国民实施音乐教育的国家行动。其适用的音乐教育资源规格属于面向全体国民的普适性层级,其基础目标是为了促进国民音乐文化素质的提高与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发展,长远目标则是为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贡献创造力资源,为社会人文的全方位、深层次发展构筑一个可持续的、坚强有力的“拉动机制”。

本书所探讨的国民音乐教育,主要指的是整个狭义板块,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第二个层次;与此同时,也包括广义板块中的全部公益部分。在各个单元议题展开的过程中,那些非公益的事项,也将选择性地用作参考,但不深入论述。

基于这样的前提,让我们首先从当下的实际出发。要将近几十年来(根据实际需要,时间上限可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本书的重点还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作为坐标)所取得的音乐艺术成果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活生生的现实,很有意义,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很难。它的意义,笔者已在前言中作了比较清楚的交代,在此不赘述。这里主要讲它的难处:难在哪里?难到什么程度?——本书所讨论的“国民音乐教育”,并非一个新词,从二十世纪早期到二十一世纪的百年间,前人通过著书立说,曾多次提到过。但真正和本书之意义所指相吻合的成果,却是寥寥无几。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上,关于此议题,能够列举出来的可圈可点的人物,有萧友梅、贺绿汀、周大风等前辈,他们曾经就同一个角度,表达过一些真知灼见,对真正的国民音乐教育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在后人写过的很少量的一些论题标注为“国民音乐教育”的文章中,一般说来,其总的方向都离不开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范围,但在其文章中间,也就此表达过一些零零星星的感悟式意见。总的说来,其高度与深度,可以说都远远不及这几位前辈学者。在此恕笔者直言,即便如此,前辈学者们也并没有创造出针对“真正的国民音乐教育”这一重要研究领域的系统性成果。或者说,即便有可以称之为“系统性”的成果,主要也是针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音乐教育框架予以呈现的,它们完全适用于学校音乐教育,却并不一定适用于面向全体国民。要解决这个难题,“功夫”主要还在“诗”外,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也就是说,探讨“真正的国民音乐教育”,必须要向其他相关领域伸手,除了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群众音乐工作”、“大众音乐”、“社会音乐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成果外,教育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艺术学方面的成果,也应该与之建立起直接的关联。笔者将其称之为支撑起本书中心议题的“两大板块”。另外,民族学、历史学、心理学、管理学、行政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成果,也要根据各个单元议题的实际需要进行融会贯通——相对于“国民音乐教育”这样的专题研究,在专属领域的成果匮乏的前提下,这一类成果所起的作用还不能用“一般性的交叉与参考”来描述,应该说是分量更重,缺一不可,是当之无愧的“关联性软硬件”。要整合上述成果并创造性地发展,最终自成一体,才能够赢得“国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空间。其

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以笔者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实现。目前已经展开的这点工作,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敲敲边鼓,做点尝试。至于能否成就呐喊,抛砖引玉,以笔者功力之浅陋,虽存奢望,却也唯有苦心孤诣埋头苦干,把它当做工作的鞭策和全部的追求了。下面,笔者将选取其中的几个点,作一个初步的梳理。

有关“群众音乐工作”的文献,笔者目前所能掌握的近期著作只有一种,即张月清先生所著的《群众音乐工作实用读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其侧重点在于工作经验总结和实用指导,还带有个案分析,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佐证。但除了这一本著作之外,其他的能从科学系统的高度对国民音乐教育研究进行理论支撑的重要成果,暂时还没有。另外,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其他以“群众音乐”来命名的一些成册文献,数量极少,仅有的几种,也主要集中在1949年10月到1963年的时间段内,大都为一些资料汇编、作品集,没有发现纯理论的著作。但是,关于直接涉及“群众音乐”的一些论文、信息以及一切与“群众音乐”有关的资料,笔者在2013年1月22日查阅中国知网,其间显示了从1926年到2012年的条目,总数则有56511条之多。下表是这些成果在各个阶段的数量分布情况:

“中国知网”的统计(制表人:熊岸枫)

年代	(下面的括号内为粗略的篇目数量,括号前面为年份)	备注
21世纪以来	2012(3583),2011(4914),2010(4457),2009(3546),2008(3566),2007(3461),2006(3203),2005(2721),2004(2193),2003(1857),2002(1937),2001(1544),2000(1319)	
20世纪90年代	1999(922),1998(1274),1997(1154),1996(1136),1995(1075),1994(957),1993(873),1992(935),1991(933),1990(954)	
20世纪80年代	1989(875),1988(888),1987(762),1986(701),1985(708),1984(655),1983(561),1982(565),1981(437),1980(340)	
20世纪70年代	1979(228),1978(96),1977(42),1976(10),1975(9),1974(12),1973(1),1972(1)	
20世纪60年代	1967(1),1966(5),1965(83),1964(166),1963(108),1962(95),1961(83),1960(153)	
20世纪50年代	1959(160),1958(133),1957(17),1956(79),1955(3),1954(1),1953(1),1950(1)	
其他	1937(1),1936(1),1926(1)	

在上表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对2012、2009、1999、1989、1964、1959等几个年份进行抽样分析发现:剔除其间的报道、简讯及与“群众音乐”关联不多或者实在相距太远的篇目,纯粹专属形态意义上的科研论文或调查报告,数目却并不太多。抽样分析秉持“群众音乐”形态意义的宏观标准,对其之外的那些形态专属意义明确的范畴,暂且不纳入其中。为此,笔者又专门制作了一个表格,以便于进一步对比和分析。

笔者的抽样分析(制表人:熊岸枫)

年份	知网的统计数字	基数	专门论述与关联紧密的论文及其他资料
2012	3583 篇	以 50 篇为单元进行抽样分析	抽样一:18 篇/第 1~50 篇(第 1 篇作者:任吉祥;第 50 篇作者:李卫星)
			抽样二:2 篇/第 151~200 篇(第 151 篇作者:尹晓星;第 200 篇作者:宴丽芳)
			抽样三:3 篇/第 1001~1050 篇(第 1001 篇作者:张利群;第 1050 篇作者:赵承)
			抽样四:1 篇/第 1451~1500 篇(第 1451 篇作者:陈晔;第 1500 篇作者:江楠)
			抽样五:0.5 篇/第 2601~2650 篇(第 2601 篇作者:霍怡;第 2650 篇作者:王丽圆)
2009	3546 篇	以 50 篇为单元进行抽样分析	抽样一:6 篇/第 1~50 篇(第 1 篇作者:陆晓燕;第 50 篇作者:陈君凡)
			抽样二:3 篇/第 151~200 篇(第 151 篇作者:徐娟;第 200 篇作者:汪本莉)
			抽样三:1 篇/第 1001~1050 篇(第 1001 篇作者:周兆祥;第 1050 篇作者:屠艳)
			抽样四:1.5 篇/第 1451~1500 篇(第 1451 篇作者:陈毅彬;第 1500 篇作者:徐晓红)
			抽样五:1 篇/第 2601~2650 篇(第 2601 篇作者:许菲;第 2650 篇作者:何秧)
1999	922 篇	以 20 篇为单元进行抽样分析	抽样一:3 篇/第 1~20 篇(第 1 篇作者:唐明;第 20 篇作者:李业道)
			抽样二:0.5 篇/第 141~160 篇(第 141 篇作者:居其宏;第 160 篇作者:李喧)
			抽样三:2 篇/第 521~540 篇(第 521 篇作者:陆小玲,董焰;第 540 篇作者:李晓乐)
			抽样四:0 篇/第 601~620 篇(第 601 篇作者:杨燕迪,顾森;第 620 篇作者:姜淑香)
			抽样五:0.5 篇/第 761~780 篇(第 761 篇作者:马德俊;第 780 篇作者:杨殿虎)
1989	875 篇	以 20 篇为单元进行抽样分析	抽样一:3 篇/第 1~20 篇(第 1 篇作者:陈志昂;第 20 篇作者:陈志昂)
			抽样二:0 篇/第 141~160 篇(第 141 篇作者:朱舟;第 160 篇作者:何振京)
			抽样三:0.5 篇/第 521~540 篇(第 521 篇作者:祁光路;第 540 篇作者:王和芳)
			抽样四:0.5 篇/第 601~620 篇(第 601 篇作者:刘诗嵘;第 620 篇作者:左贞观,薛范)
			抽样五:0 篇/第 761~780 篇(第 761 篇作者:刘路先;第 780 篇作者:黄其度)
1964	166 篇	以 10 篇为单元进行抽样分析	抽样一:6 篇/第 1~10 篇(第 1 篇作者:李熙林;第 10 篇作者:《人民音乐》编辑部)
			抽样二:5 篇/第 31~40 篇(第 31 篇作者:舒模;第 40 篇作者:晨耕,唐诃)
			抽样三:3 篇/第 81~90 篇(第 81 篇作者:彦克;第 90 篇作者:何占豪)
			抽样四:1 篇/第 131~140 篇(第 131 篇作者:夏宝森;第 140 篇作者:万苇舟)
			抽样五:5 篇/第 151~160 篇(第 151 篇作者:(空);第 160 篇作者:鸣亚)
1959	160 篇	以 10 篇为单元进行抽样分析	抽样一:3 篇/第 1~10 篇(第 1 篇作者:周永翔;第 10 篇作者:林韻)
			抽样二:3 篇/第 31~40 篇(第 31 篇作者:马思聪;第 40 篇作者:海鹏)
			抽样三:1 篇/第 81~90 篇(第 81 篇作者:宋运昭;第 90 篇作者:叶林)
			抽样四:0.5 篇/第 131~140 篇(第 131 篇作者:席明真;第 140 篇作者:(空))
			抽样五:3 篇/第 151~160 篇(第 151 篇作者:陶克;第 160 篇作者:杨琦)

相比公益性的“群众音乐”,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大众音乐”,其研究成果则呈现

出另一番面貌。通过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大众音乐”的普适性特征迅速成长。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欧美国家,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从传播学或大众传媒理论的高度催生出大量真知灼见及系统性研究成果,已然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并依然延续着一个又一个新的传奇。虽然“大众音乐”的功利目标与国民音乐教育的主流公益属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其传播的高效率、于功利之中衍展出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公益效应,都值得大力借鉴。可以说,二者之间的“交叉地带”是比较宽广的。而非常遗憾的是,因笔者目前的条件所限,只是掌握了这些成果中很少的一部分,相对于国民音乐教育研究的远大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

下面的表格继续沿用上述两个表格的体例,但第二个表格的抽样分析因“大众音乐”的特殊属性而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中国知网”的统计(制表人:熊岸枫)

年代	(下面的括号内为粗略的篇目数量,括号前面为年份。)	备注
21 世纪以来	2013(8),2012(3119),2011(3953),2010(3486),2009(2626),2008(2313),2007(2250),2006(1953),2005(1466),2004(1065),2003(798),2002(575),2001(463),2000(360)	
20 世纪 90 年代	1999(255),1998(244),1997(215),1996(196),1995(213),1994(167),1993(127),1992(103),1991(72),1990(93)	
20 世纪 80 年代	1989(55),1988(70),1987(49),1986(49),1985(57),1984(30),1983(29),1982(43),1981(23),1980(18)	
20 世纪 70 年代	1979(11),1978(11),1977(4),1976(1)	
20 世纪 60 年代	1967(1),1966(5),1964(3),1963(3),1962(1),1961(2),1960(6)	
20 世纪 50 年代	1959(6),1958(3),1956(3),1955(1),1954(1)	

在上表的基础上,笔者选择对 2012、2010、1999、1998、1988、1985、1979、1978、1960、1959 等几个年份进行抽样分析。抽样分析秉持“大众音乐”形态意义的实证标准,其之外的一些形态专属意义明确的范畴,因极有可能与其社会功能属性存在密切联系,也应纳入其中。

笔者的抽样分析(制表人:熊岸枫)

年份	知网的统计数字	基数	专门论述与关联紧密的论文及其他资料
2012	3119 篇	以 50 篇为单元进行抽样分析	抽样一:31 篇/第 1~50 篇(第 1 篇作者:陈林,李岩;第 50 篇作者:董高颀)
			抽样二:15 篇/第 151~200 篇(第 151 篇作者:叶键;第 200 篇作者:郑小瑛)
			抽样三:8 篇/第 1001~1050 篇(第 1001 篇作者:胡吟久;杨君武;第 1050 篇作者:邓陶)
			抽样四:7 篇/第 1451~1500 篇(第 1451 篇作者:《广告人》编辑部;第 1500 篇作者:焦坤)
			抽样五:1.5 篇/第 2601~2650 篇(第 2601 篇作者:涂婷;第 2650 篇作者:白雪)